

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

张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 100007)

[内容摘要] 宗教作为一部分人解决个人终极关怀的唯一手段和实践体系,它在使人们保持心理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了解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不仅对认识日本社会文化的特点大有裨益,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原始宗教;多元信仰;和谐;茶道

[中图分类号] B99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09)01-0080-07

[收稿日期] 2009-02-11

[作者简介] 张建立(1970-),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也往往因时因地而异。邪教的害处固然需要全力予以根除,但宗教作为一部分人解决个人终极关怀的唯一手段和实践体系,它在使人们保持心理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多种要素相互配合相互统一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去努力,更需要从社会文化发展和社会心理角度,去关注人们的心理状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生活等各方面竞争异常激烈的日本,无论是在日本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飞速进展的过程中,还是在日本社会经济发展舒缓、“格差”问题日益凸现的今天,宗教在稳定社会、安定人心方面都发挥了并且正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解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不仅对认识日本社会文化的特点大有裨益,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现状

在狭长的日本岛上,不但到处散落着各种从属于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系统的庙宇祠堂,而且无论是喧嚣繁华的大城市,还是人迹罕至

的穷乡僻壤,几乎每个市町村都会有其独自奉祭的大小神社。仅从种类繁多的宗教设施也可以直观地判断出日本人是笃信宗教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关于日本国民宗教观的舆论调查却显示,大多数的日本人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

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NHK广播舆论调查所曾就日本人的宗教观进行过舆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就已经有65%的人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了^[1]。2001年12月15日、16日,《读卖新闻》又连续两天实施了关于日本国民宗教观的全国舆论调查。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信仰什么宗教吗?针对这个问题,回答有宗教信仰的,只占接受调查者总数的21.5%,而回答没有宗教信仰的,则达到了77.3%。针对第二个问题“现在,你认为过幸福的生活宗教重要吗?”回答重要的占接受调查者总数的33.6%,而回答不重要的则为61.7%^[2]¹³⁷⁶。2005年8月6日、7日,《读卖新闻》又实施了同样的关于宗教观的全国舆论调查,针对设问的回答情况几乎没有多大变动。如针对第一个问题“你信仰什么宗教吗?回答有宗教信仰的,只占接受调查者总数的23%,

而回答没有宗教信仰的占了 75%。针对第二个问题“现在,你认为过幸福的生活宗教重要吗?”回答重要的为 35%,而回答不重要的为 60%^[31]。从以上的调查统计数据来看,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数字相比,近些年来,回答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者是有增无减。因此,很多欧美人、甚至很多日本人自己,也往往根据这一统计结果,判断日本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

的确,如果仅凭上述这些统计数字来做判断的话,因为 4 个日本人中几乎就有 3 个人称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所以由此认为日本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似乎不无道理。但是,日本人事实上究竟是不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呢?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人说其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话,我们会把他理解成一个不信神佛等的无神论者。但是,在上述 2005 年 8 月《读卖新闻》实施的关于宗教观的全国舆论调查中,还设定了“痛苦的时候你是否想过求助于神佛?这样一个问题,回答想过求助于神佛的占接受调查者总数的 54%,回答没想过的占 44%。而且,在针对“你信仰什么宗教吗?这个问题作了否定回答的人中,也有 47%的人回答想过求助神佛。此外,其他有关宗教设问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在将近 80% 的日本人家中,都设有祭祀神佛的神棚、佛龕、祭坛之类的场所;有 50%乃至近 80% 的日本人,平素一直坚持祭神、供佛、奉祖。并且,很多人为了身家安康、消灾除厄、生意兴隆、考试合格、婚姻如意等,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求助神佛之事^{[2]377}。这些都充分表明,虽然很多日本人口头上表示不信仰任何宗教,但他们心里还是相信神佛的存在,遇到困苦时还是想求助神佛,实质上也就是信仰宗教的,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或者不愿意过那种清

规戒律约束下的教徒生活而已。也就是说,很多日本人在对待宗教的言与行上,显然是存在着很大矛盾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现象呢?笔者以为,这恐怕还是受狭义的宗教观影响过深所致。大多数的日本人,在回答有没有宗教信仰时,条件反射性地仅把拥有教祖、教义、教仪、教团组织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战后兴起的一些被称为新宗教或新新宗教团体理解为宗教,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

在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无论是对知识精英还是普通民众,狭义“宗教”观的影响一直都是非常大的。所谓狭义的“宗教”观,即认为真正的宗教应该至少包括如下四个层面:其一要有教祖;其二要有教义,即宗教的思想观念及感情体验;其三要有教仪,即宗教的崇拜行为及礼仪规范;其四要有宗教的教职制度及社会组织(教团)。按照这一标准,很多知识精英认为,能够真正称得上是宗教的主要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日本根本不存在独自的真正的宗教。所以,对于既没有创始人、教义,亦没有神的教导和严格戒律的神道,也就不能被称之为宗教,而只能看作是日本的“固有信仰”、“民间信仰”,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种“原始宗教”了。而“原始宗教”一词,原本具有‘低级’、‘原初’和‘落伍’等多种负面含意,它实际上是在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背景的古典进化理论的文脉中对民族和宗教的形态进行了高低排序,其中隐藏着对‘原始宗教’之属于‘前宗教’或‘非宗教’(异教)、“原始宗教”的信仰者之不属于‘文明’或其处于‘野蛮’状态的价值判断。^[4]

如今,研究日本宗教的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既有鸿篇巨制的通史、断代史性的研究,亦不乏

关于探讨日本人对“宗教”概念的理解的代表性论著有:羽賀祥二《明治維新と宗教》(筑摩房 1994年)、新田均《近代政教關係の基礎的研究》(大明堂 1997年)、島園進《日本における宗教概念の形成》(山折哲雄他編《日本人はキリスト教をどのように受容したか》所収,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シタ 4 1998年)、山口輝臣《明治国家と宗教》(京大学出版会 1999年)、磯前順一《近代日本の宗教言説とその系譜 第一章 近代における宗教概念の形成過程》(岩波店 2003年);島園進《現代日本と宗教》——超越的普遍性理念とその相対化》(池上良正等編《岩波講座 宗教 第 10 宗教のゆくえ》岩波店 2004年)。

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綱》,金港堂 1899年;村上重良《近代民衆宗教史の研究》,法藏館 1958年;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諦成主编:《日本佛教史》3卷,法藏館 1967年;村上重良:《近代日本の宗教》,讲谈社 1980年;杨曾文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

分门别类精雕细刻的专题研究。在诸多先行研究的论著中,也都程度不同地提及到了日本的宗教意识、国民宗教信仰的一些特点,并留下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对于诸先学的研究业绩早有定评,无需我等后学再妄加赘言评述。不过,通过研读诸先学之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多日本学者特别是宗教研究者都是基于对“宗教”一词的狭义理解来从事研究的,因而神道信仰行为自然不能被其作为宗教信仰看待,神道也就很难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最初把神道信仰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多是一些日本民俗学者,而非宗教学者。一般的日本思想文化研究者,即使研究神道,也仅是将其作为民间信仰,而不是作为宗教来研究。由于受狭义宗教观的影响,再加之神道与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过于密切,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年头年尾,民众生活中处处都可以观察到神道信仰的点点滴滴,所以致使包含日本的知识精英们在内,大多数的日本国民都没有把神道当作“宗教”来认知。二战前,日本政府之所以敢于公然宣称,神道不是宗教,而是国民必须信仰遵奉的“国家宗祀”,并规定“敬神忠皇和参拜神社是国民的义务,从而一举将神道成功地奉为高居于各种宗教之上的国教,与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也是不无关系的。

1945年日本投降,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军最高总司令部(GHQ)进驻日本后,于当年12月15日发布《关于废除国家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之保证、支援、保全、监督及公布的指令》,废除了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一切保护扶持措施,实施真正的政教分离。而且,该神道指令还特别强调:作为一般国民,有不参加神社祭仪的自由,相反,作为政府官员没有以官员身份参拜神社的自由。1947年5月3日,盟军占领下的日本颁布了《日本国宪法》。该宪法第二十条规定:“信教自由,对任何人均予保障。任何宗教团体均不得接受国家授予的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力。任何人均不得强制他人参加宗教之行为、祝典、仪式

或活动。国家及其机关均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通过《神道指令》《日本国宪法》的颁布实施以及1951年4月《宗教法人法》等法律政策的制定实施,从名义上打破了神道独尊于各种宗教之上的地位,使神道成为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地位平等的宗教。另外,自二战以后,至少在学术界已经开始把神道作为宗教之一来研究,特别是作为日本的民俗宗教,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宗教学者的研究视野,相关著述也开始不断增加。

但是,尽管如此,从前文所举的至今为止关于日本国民宗教观的舆论调查数据来看,狭义“宗教观”对日本国民的影响依旧是很深的,在大部分日本人心目中并没有把神道视为宗教,所以他们才会做出没有宗教信仰的回答,才会给人造成一种日本人缺乏宗教信仰的假象。如果他们把信奉神道能理解成是宗教信仰的话,那么说日本是全民信教也不为过了。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宗教统计数字显示,与佛教、基督教等其他教派相比,无论在宗教法人团体数量、教师数量上,还是在信徒数量方面,日本神道一直都是独居榜首的。1980年日本总人口为1亿1706万人,神道教的信教人数为9584万多人,次居第二位的佛教的信教人数为8774万多人,基督教的信教人数仅为119万人,这三教之外的所有宗教信教人数合计为1578万余人。到1985年,神道教的信教人数增加为1亿1560万人,仅是神道信教人口就已经与当年的日本总人口1亿2104万人相差无几了。同年,佛教的信教人数为9265万人,基督教的信教人数为168万余人,其他所有宗教信教人数合计为1444万余人。自1990年至2004年,日本总人口分别为1亿2361万人(1990年)、1亿2526万(1995年)、1亿2692万(2000年)、1亿2748万(2002年)、1亿2768万(2003年)、1亿2777万人(2004年),相应的神道教的信教人数分别为1亿900万(1990年)、1亿1692万(1995年)、1亿795万(2000年)、1亿777万

谷省吾:《祭祀与思想——神道的祈祷》,国书刊行会1985年; 藁田稔:《神道——日本的民族宗教》,弘文堂1999年; 张大柘:《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代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西谷啓治:《根源的主体性の哲学》,弘文堂1940年;西谷啓治《现代社会の諸問題と宗教》,法藏馆1951年;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店1961年;中村元:《洋人の思维方法3日本人の思维方法》(中村元選集3),春秋社1962年;仁户田六三郎:《日本人の宗教意識の本質》,教文馆1973年。

(2002年)、1亿 755万(2003年)、1亿 858万(2004年),神道教的信教人数连续多年总是维持在与日本总人口数大体相近的水平^[5]。这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战后至今的日本人心目中,神道的独尊地位并没有被动摇。而且,这也充分表明,虽然有些自称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日本人并没有认识到其平素的祭神供佛奉祖的行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宗教信仰的体现,但因此就称日本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这显然是不妥的。

二、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特点

通过分析关于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多年的统计数据,可以得出近现代日本人宗教信仰的两个极为显著的特点:第一,尊崇神道亦兼信他教,可谓是见神诚奉祭,遇佛勤烧香;第二,注重现世,敬神礼佛奔教堂,熙熙攘攘皆为利往。

首先,关于近现代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第一个特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研修所编辑的《第56次日本统计年鉴 2007》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4年的宗教团体(包含宗教法人)有22万4540家,共有信教人数约为2亿1383万人,与之相对,2004年日本的总人口为1亿2778万人,2005年日本总人口数为1亿2776万人,日本的信教人数竟然比日本总人口数还要多,而且多出将近一倍,这至少说明每个日本人大概平均兼信着近两种宗教。而且,自1980年以来,20多年来的日本总人口数和信教人总数几乎一直都保持着这种比例^[5]。日本统计年鉴连续20多年的统计数据,有力地例证了日本国民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特点。

事实上,日本人在信仰上也的确是没有什么严格限制的,他们除了信奉神道以外,还可能同时在信奉着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而且他们往往是宁愿祈求所有神灵都保佑他,也不愿笃信其中一种。如现代日本政治家麻生太郎本身是个虔诚的基督信徒,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日本神道的信奉者。日本人就是这样将佛教、神道、基督教及新兴宗教相互交织成一个信仰网络,尽管各种宗教教义大相径庭,他们却可以根据现实目的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予以变通,将多种宗教的神灵容纳于自己的信仰体系之中,使其彼此共存却“井水不犯河水 相安无事。如果能到日本实地生活上一段时间,可能对日本人那种见神奉祭、遇佛烧香

的多元信仰特征会有更切身的体会。而且,如前所述,其中,神道的信教人数,自1985年以来至今,每年的统计数据与日本总人口数都相差无几,这也就是说,虽然日本国民信仰呈现多元化的现象,但神道的独尊地位还是没有丝毫改变的。

其次,近现代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第二个特点是,日本人非常注重现世人生,对虚无缥缈的来世人生则兴趣索然。日本人对宗教的真正要求不在于高深的哲理体系、玄妙的彼岸世界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大家熙熙攘攘地敬神礼佛奔教堂,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安全、商业繁荣、事业发达、生活如意、婚姻幸福等现世的利益。在日本的每个市町村,大多都会有一个供奉氏族神的神社或保护一方安宁的地藏,但日本人无论是对待神佛还是对待基督都是很实际的,供奉他们为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消祸。如日本人的神道祭祀礼仪,在祈愿之前,要先由相应级别的专职人员向神敬奉备好的新鲜洁净的山珍海味,而且还要敬献币帛之类的物品,并诵读赞誉神德的“祝词”,以此来祈求神的保佑。整个祭祀仪式看起来有点儿像请客、疏通、贿赂、吹捧、哀乞。神对日本人来说,是可以带来佳肴、美色、功利、安逸的权力,而不是什么高迈的人生理想。俗语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太多太多的困苦和无奈,当其难于自力更生又无助时,便会自然求助于灵验之神圣。就如同有病乱求医一般,日本人之所以会同时祭拜几种宗教的神,也正是为了确保切身利益的迫切心情所致。除了一些爱咬文嚼字的酸腐学者外,恐怕很少有哪个日本人会去认真地考虑各种宗教的教义是否矛盾,各种神是何派别,是否对立等等,更不可能去在意什么信仰的虔诚和纯洁。日本人新年祈福不但要去神社,还会去寺院,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红、白之事,也常常是各种宗教兼用。比如,祝贺小孩生日大多会到神社去,而结婚仪式则可能选择基督教堂,举行丧礼则又会选择佛教寺院。这种现象,对西方虔诚的基督徒、东方的佛教徒、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这些信奉一神教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的,但日本人对此却是不屑一顾的。

三、国民宗教信仰的影响

日本国民的上述宗教信仰折射到实际社会生

活中,其影响是深远的。简言之,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第一,“见神诚奉祭、遇佛勤烧香”这种多重信仰,有助于形成日本人的多维价值观,使其在对某一事物作价值判断时,不会仅拘泥于一个标准进行非此即彼“二者择一”式的选择,在社会生活中亦不会受既定思想观念的束缚,而是能够做到灵活处事、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善于适应各种不断变化着的现实。

第二,注重宗教为现实服务的特性,容易使“有用与否”成为日本人付诸行动的判断标准,使日本人更加注意从实际出发去判断事物,不会去做无谓的牺牲。日本国民信仰的这一特征,不但在随意取舍扬弃外来文化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在国内大的政治转换期也体现得非常突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时,日本能够兵不血刃地顺利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权更替,完成历史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种宗教信仰的积极影响。

第三,日本国民宗教信仰对日本社会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使日本人的宗教活动日趋世俗生活化,同时亦使世俗生活被宗教化。

由于日本国民宗教信仰极其重视追求现世现实利益,因而使其宗教生活世俗化的倾向尤为突出。日本宗教信徒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世俗社会成员,如日本僧侣的生活与俗人相差无几,他们可以边高声念诵扫地莫伤蝼蚁命,边杀生吃肉;他们可以边高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边结婚生子且可以子承父业。其实,在日本,世俗社会与宗教的世界是没有被严格区分的。日本人最尊崇的神道世界,就是一个圣俗一体相连的世界。神道中,作为祖先神信仰的众神都是具体的各个共同体的神,而不是向世界和人类开放的、具有普遍性格的神。众神都在各自统辖和掌管的领域内,发挥着各自的功能,保佑着共同体内成员的安康,它们是共同体意志的神格化。共同体与共同体的祖先神是一致的,所以神的世界里的情形不过是现实中的情形的反映^[6],也就是说,神与人的世界是同

一的。著名宗教学者中村元早就指出:“大多数印度人与一般中国人试图把宗教世界与肉欲世界区别开来,反之,在日本人中间有一种潜在的倾向,要把两者等同起来。”^[7]

另外,宗教活动与世俗生活特别是一些文娱活动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宗教活动不单纯是一种对清规戒律的循规蹈矩的遵守执行,还加进了许多游戏娱乐的成分,很多娱乐活动也往往要冠以宗教之名才能堂而皇之地进行,这又无形中给世俗生活赋予了许多宗教意义,使得世俗生活日趋宗教化。日本有很多被冠以“道”字的文化,比如有固本之食道、长智之书画道、积勇之武道、增美之花道和清神之香道、乐道,还有集以上诸道为一体的日本茶道。日本这些“道”文化的盛行,也正是因为日本宗教生活世俗化、社会生活宗教化的影响所致。为了使大家对此有个更好的理解,下面不妨以诸“道”之首的日本茶道为例来做一简单的说明。

茶道茶道,通俗点儿讲也就是喝茶之道了,其实只要有佳茗、丽水、好心情,本应无需讲究过多,但日本茶道则不然,它是一个以吃茶活动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其内容涉及建筑、庭园、书画、陶瓷器、竹器、漆器、花道、香道、烹饪、礼仪、点茶方法等等,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茶人们在重视茶道的世俗性的同时,又对这些日常生活的时空物事都赋予了一定的宗教意义,因而使饮茶这一世俗生活之事又具有了很强的宗教性。

在日本茶道古典文献《南方录》“觉书”中,禅僧南方宗启记述千利休的话说:“小草庵里的茶道,首先要依佛法修行得道为根本。追求豪华的房宅、美味的食品,那是俗世之举。家不漏雨、食无饥苦便足矣。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8]日本茶道早就有“茶禅一味”之称,这里的“佛之教”、“佛修行之行为”也主要是指禅及参禅之修为讲的。

冈仓天心在其撰写的《茶之书》中亦称:“茶道是一种审美的宗教,它是一种崇拜存在于日常

山折哲雄:《日本人的宗教意识》,《呼兰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此外,关于日本人宗教意识方面的研究论文还有刘学:《日本人宗教意识的研究》,《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9月第24卷第5期;殷英、杨建虹:《日本现实主义宗教观的形成及其影响》,《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3月第21卷第1期。

生活的琐碎事物上具有美感的事物的仪式。^{49]}

日本学者久松真一先生则更明确地指出,“茶道是对禅进行的一次宗教改革,它把禅从寺院伽蓝中解放出来,回复到了在家的露地草庵;把远隔世俗的禅僧脱化为作为居士的茶人,创造了禅院、禅僧们无力创出的庶民的禅文化。这个新的禅文化生活包括了人间生活内容的全部。”^{410]}

虽然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对茶道的影 响都非常大,但是,相比而言似乎都不如佛教的影响那么显著,以至于茶人们往往喜欢与佛教联系起来论说茶道。比如,就拿茶室及其外面的庭园这些习茶的场所而言,也就是一般我们称之为茶室、茶庭的地方,茶人们多将其视为类似于佛教修行的“道场”。再具体到茶室外面的庭园而言,茶人们一般并不使用“茶庭”一词来称谓,而是称之为“露地”。

“露地”本是佛教用语,出自佛教法华经经文中的“争出火宅,安稳得出,端坐露地”。佛教中将众生生死轮回的充满烦恼苦难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称为“三界”,用在火中燃烧的房屋即“火宅”来比喻“三界”;与之相对,“露地”则是代表脱离于三界之外的没有烦恼苦难、清净无一物的境界。千利休认为,茶庭是用来表示“清净无垢的佛的世界”^{481]},所以用佛教用语“露地”来称谓茶庭,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也正因此,露地的设置虽也是出于一定的实际需要,但更多的则是作为这种佛教净土的重要精神象征而存在的。在茶道中,露地大多会被设置成一个花草树木水石相间的近似天然的山野空间。进入露地,你可以沿着点缀于山野林间幽曲的飞石小径,悠闲漫步于芳草中,闻天籁,赏朝夕雨露风霜,观四季雪月飞花。在通往草庵的途中,还会设有一个形同虚设的小小的柴扉。但是,因为露地是作为这种佛教净土的重要精神象征而存在的,所以露地中的所有景致的设置,其目的并非仅是为了供人欣赏。露地所构筑的是一个“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的净土,其目的在于使修茶者净心怡神,所以千利休说:“在露地草庵中,拂去浮生俗尘,主客坦诚相待,抛却所有规矩尺寸格式等等,焚火、烧水、吃茶,莫问他事,此乃佛心之显露也。”^{481]}

人们常喜欢用“和、敬、清、寂”这四个字来概括日本茶道的精神。借用千利休的话说,这“清”

字也就该是“拂去浮世俗尘”之义了。这里的所谓“浮生俗尘”,除了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尘埃之外,当还有一种心灵的尘埃之义。禅宗南宗慧能与北宗神秀当年在禅宗五祖弘忍处修道时,曾奉师命各作过如下偈语。神秀作的偈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作的偈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使惹尘埃”。日本茶道之“清”,亦正是汲取了这二位得道高僧充满禅机的偈意。因此,日本茶道中众多的洗洗涮涮和清扫动作,并非仅是日常生活层面的扫除,还有着更深层的含义,即完成这些动作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修习者心灵的一种净化和升华的过程。茶道中很多动作都是具有这种意义的动作,如在露地中用水净手清口的动作等等,就不一一细说了。

另外,茶道宗师们还要求茶道的修行者们,不只要把茶庭、茶室看做修行道场,而且要把自己的立身之地都看作是修行道场。千利休之孙千宗旦曾为习茶者们写过这样一句话“终日行不动一步”^{411]}。这话在字面上是相当令人费解的。一个人从早走到晚,腿快的人走个百余里的路程也应不成问题,怎能是“不动一步”呢?其实,这是句禅语,与禅宗典籍《临济录》中的“在途中不离家舍,离家舍不在途中”含义相同。宗旦意在以此语告诫习茶者:对于一个真正的茶人来说,茶道的道场不仅局限在茶室中,而应该“步步是道场”。于是,本来只是喝一碗茶的日常生活小事、俗事,被如此上纲上线地一搞,也就变成了不可小窥的修行得道之大事了。

日本茶道曾被视为秩序、礼仪、教养的代名词,它在提高日本国民素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之大也是无法估量的。从日本茶道的修习人口情况来看,其所分属的社会阶层非常广泛,既有皇室贵族政客大贾,更不乏地位低微的普通民众。由于日本茶道既是宗教化的世俗生活,同时亦是世俗生活化的宗教,所以,广大的日本茶道修习者们或将茶道视为其不为无益事且度有生闲暇的娱乐手段,或将茶道视为创造交友之缘的工具,或将茶道视为修行得道的指月之指,每位茶人都可按照适合自己的形式,从日本茶道中获得一份闲情雅趣,获得些许心灵的慰藉。日本茶道作为一个综合性的

生活文化体系,可以说从方方面面满足了日本人的诸多身心要求。

总之,如上所述,在日本,宗教的世俗生活化,避免了诸多宗教清规戒律对人性的过度压抑;而世俗生活的宗教化,则又避免了人性过度的放纵和堕落。

以上,分别介绍了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那么这些日本国民宗教信仰的特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关于其成因,目前,有的研究欲从地理因素方面寻求解释,有的研究则从文化心理方面进行了探寻,也有的研究从宗教教义本身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实际上,除了上述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心理以及宗教教义本身之影响等原因而外,日本的宗教法律政策对形成日本人“尊神道、兼信他教”这种多元信仰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遗憾的是,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尚不是很多,笔者将另行撰文对此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 NHK放送世論調査所. 日本人の宗教意識 [M]. 日本

放送出版協会, 1984.

[2] 読売新聞社世論調査部. 日本の世論 [M]. 弘文堂, 2002.

[3] <http://www.yomiuri.co.jp/national/news/20050901i-116.htm>

[4] 周星. “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 [J]. 开放时代, 2006(4).

[5] 总务省统计研修所. 第56次日本统计年鉴 2007 [EB/OL]. <http://www.stat.go.jp/data/nenkan/index.htm>.

[6] 崔世广. 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西欧、中国的比较 [J]. 日本学刊, 1995(5).

[7] 中村元. 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 [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246.

[8] 南方録・後 [A]. 茶道古典全集第4 [M]. 淡交社, 1977.

[9] 冈仓天心. 茶之书 [M]. 东京: 岩波书店, 1929: 19.

[10] 久松真一. わびの茶道 [M]. 一灯園灯影舎, 1987: 8-9.

[11] 倉行洋. 世界の中の茶道 [A]. 千宗室. 海外の茶道 茶道学大系別 [M]. 淡交社, 2001.

Current Status, Characteristic and Influence of Japanese National Religious Belief

ZHANG Jian - li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Religion, as the only method and practical system to solve the individual ultimate concern for some people, can help people maintain the psychological harmony, which we should not ignore.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characteristic and influence of Japanese national religious belief, because it is not only of great benefit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Japanese social culture, it also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of current socialist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for our country.

Key words: primitive religion; multi - belief; harmony; tea ceremony

[责任编辑:郭冬梅]

关于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谷省吾:《祭祀与思想——神道的祈祷》,国书刊行会 1985年;藺田稔:《神道——日本的民族宗教》,弘文堂 1999年;张大柘:《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代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年。